

0509

伊克昭文史资料

伊克昭文史资料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伊克昭盟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伊克昭文史资料第八辑

伊克昭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内蒙古伊克昭盟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四年四月

1

伊克昭文史资料第八辑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伊克昭盟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内蒙古东胜市)

内蒙古鄂尔多斯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3 字数:120千字

1994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

刊号 NZ15—1117 定价:3.00元

2

EAS/21

主 编 白音生卜尔

副主编 王文元

目 录

生命之树常青

..... 石玉璞 忆述 郭俐爽 执笔(1)

谁说女人只有眼泪

..... 珊 丹 忆述 尹瑞平 靳明群 执笔(6)

马背放歌铸“铁嗓”

..... 杨玉兰 忆述 王 鑫 执笔(9)

心系绿色谱春秋

..... 刘桂蓉 忆述 王 鑫 执笔(13)

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

..... 格根托亚(17)

拼搏的足迹

..... 白志洁 忆述 张 瑞 执笔(21)

教师——我的心愿

..... 查 干(25)

献给高原母亲的声音

..... 马苏棠(28)

一心无悔医学梦

..... 苏爱英 忆述 刘 捷 执笔(33)

情系草原

..... 冯 峰(37)

新闻生涯展示录

..... 齐凤元(42)

点点滴滴

..... 全秉荣(49)

我的园丁之路

..... 常 英 忆述 张 瑞 执笔(55)

耕耘,在希望的田野上

..... 安 源(60)

自 述

..... 郑序先(65)

我的创作之路

..... 哈斯戈壁(68)

“普救含灵之苦”

..... 杨 林 忆述 尹 志 执笔(73)

为了高原深处开出更多的花朵

..... 刘治本 忆述 王志红 执笔(78)

道路坎坷 信念永存

..... 刘明珍 忆述 张 瑞 执笔(82)

毛乌素沙漠的变迁与气候

..... 贺 勤 编写(87)

生命之树常青

石玉璞 忆述 郭俐爽 执笔

归结起来，我这半生有三个没想到。没想到自己会从地处华北平原的故乡跨越 1000 多公里来到内蒙古，在鄂尔多斯高原扎了根；没想到自己的人生旅途是那样的曲折；没想到自己会做大半辈子妇科医生。

我的原籍在河北省辛集市。1940 年出生时，已经有四个哥哥一个姐姐。幼年的我身体瘦弱，从医的哥哥们让我长大当医生。1959 年中学毕业以后，我报考了河北省医学院，却莫名其妙地收到内蒙古医学院的入学通知。一起被分配来的 12 人有一半没报到就返回去了，我却天真地留了下来。1964 年毕业以后，当时在呼和浩特任副市长的表兄让我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我顺从地离开自治区首府，只身到了伊金霍洛旗（以下简称伊旗）医院。那年我刚 23 岁。

风沙大，条件差，饭碗边上都是沙子，这就是伊旗给我的第一印象。一切全都是陌生的，远没有我想象的好。可是，医生与患者的特殊关系，使我很快熟悉了这里的环境、这里的人。医院虽小，内外儿妇科俱全。各科患者我都接诊。

身为医生，终日活动在一片白色平和的小圈子里，对政治运动缺少一根敏感的神经。可偏偏因为一次“政治事件”，平地却起了风波。

我生性耿直，办事、走路都比别人快半拍。谁料有时直率也

会带来麻烦。1965年,《内蒙古日报》上刊登了一篇介绍伊旗医院先进事迹的文章。我看后发现有不实之处,便随意勾画了几笔。第二年,也就是“文革”初期,小小一个旗医院也难成净土。旧事重提,我无端被扣上“反对先进就是反革命”的帽子,揪斗抄家不说,最难容忍的是剥夺了我行医的权利,强迫我拖着9个月的身孕去打扫卫生。我被折磨的颅骨凹陷性骨折和尾骨骨折。我爱人也难逃厄运,致使慢性迁延性肝炎复发。

在阴霾笼罩的那些日子里,虽然无法猜测明天会发生什么,可我和爱人却相互鼓励着,总是抱定一个信念:乌云总会散去。

1968年12月28日,我把冤屈和眼泪咽到肚里,忍痛离开病中的爱人,带着行李和孩子到了布连卫生院。在布连,“文革”气氛并不怎么浓,卫生院领导和老乡也不把我当“反革命”对待。职工们和睦相处。在那里,我经常出诊学会了骑马、骑驴。使我永久不能忘记的是,当地父老乡亲们对我的那种纯朴的感情。一次出诊到农民家里,主人借上荞面款待我,自个儿却吃煮山药。

1969年3月某天凌晨一点,顺壕大队王家梁小队有位产妇忽略性横位,难产3个多小时,生命垂危。为保母婴平安,我当机立断:做乙醚开放麻醉,实行内倒转术。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治疗方案。在会计兼司药的密切配合下,15分钟后婴儿出生,处于休克状态。我立即口对口地吸出羊水。不一会儿,婴儿啼哭了,小生命得救了。这时,大汗淋漓的我看到产妇全家人发出了欣喜的微笑,竟忘记了劳累。

在布连,山川沟塔村村庄都留下了我的脚印。三年中,我跟同事们相互配合,用办公桌当手术台,开展了肠梗阻、阑尾切除、剖腹产、骨折正复、巨大疝气修补、宫外孕和人工流产等大大小小的外科、妇科手术,抢救危重病人30余例,医治患者5千多人次。

1971年3月,旗里调我到新街战备医院。布连人舍不得我离

开，把调令压了 7 个月，才放我走。

新街地处交通要道。到战备医院求医的除了本旗西部 5 个公社的，还有外旗和外省的。为适应工作，医院派我参加了内蒙军区办的野战外科学习班。此后，我主刀开展了胃大部切除，胆囊、脾切除、骨折内固定等外科手术，在外科领域的探索上又前进了一步。

1972 年腊月 23 深夜，大柳塔公社来人求援，说一位施行剖腹产术后 9 天的产妇生命垂危。当我乘车赶到患者那儿已是凌晨 4 点。产妇伤口感染，肠管裸露，我没顾得休息，立即为产妇做了钢丝缝合。20 天以后病人终于痊愈出院。

1975 年 9 月，我调到伊克昭盟（以下简称伊盟）医院工作。当时有句顺口溜叫“金眼科，银外科，又脏又累妇产科”。我却听从组织的安排，到了妇产科。1976 年，随 12 人组成的医疗队前往唐山地震灾区参与救护。1979 年，到山西省第二附属医院参加全国妇产科进修班。这次进修，使我有机会学习国内最先进的妇产科诊治技术，为我后来在妇科领域继续向“高、难、深”探索，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1982 年，我主刀开展了宫颈癌腹膜外淋巴结根治术，绒癌、卵巢癌根治术，恶性葡萄胎根治术等妇科大手术，并配合进行了术后化疗。这类手术的成功开展在盟医院是前所未有的。1989 年，又做了全院首例乙状结肠代阴道手术，获盟医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1987 年以后，我对医学理论进行探讨，总结自己多年临床实践，撰写了 14 篇论文，先后在国内有关杂志和学术会议上发表或宣读。主要篇目有：《液氮冷冻治疗宫颈炎疗效分析》、《腹式切口绝育术 3260 例临床分析》、《伊盟部分地区中老年妇科病 5800 例临床分析》、《阴道滴虫病》、《会阴侧切皮内缝合 1506 例临床分析》、《女性性冷淡 340 例临床分析》、《阴道滴虫病 15174 例临床分析》、《径腹膜外淋巴切除行子宫颈癌根治性切除的临床体会》、

《女性尖锐湿疣 26 例临床疗效观察》、《35 例前置胎盘出血休克的治疗体会》、《尼尔雌醇治疗更年期综合症 288 例临床分析》。

1990 年 11 月，我和杨秀珍大夫带着《子宫肌瘤的子宫切除术式及卵巢去留 625 例临床分析》的论文，参加了全国妇产科子宫切除、新生儿复苏学术研讨会。大会从收到的 1300 多篇论文中选择 41 篇在大会上宣读。我宣读的这篇论文被评价为具有广泛推广价值和临床意义的论文。妇产科收治的病人，大部分来自农村牧区，收入微薄。我认为，古往今来，凡真正投身医疗事业均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如趁人之危，贪图钱财，就为医德所难容。

现在，我年过 50，仍整日奔波于病房门诊间。为抢救患者生命，几个小时不下手术台是平常事。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使我一到手术室就进入忘我状态，精益求精地去完成每一例手术。我做过上万例外妇科手术，万余例绝育手术，从未出现一例医疗和责任事故。

我在伊盟已经度过 29 年的风雨人生。29 年来，我的家人跟我一起吃苦受累，承担风险。而又一起分享成功的幸福和快乐。我的爱人始终给予我最大的支持。在无数次的半夜敲门声和电话铃声中，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一次又一次地把我送到医院，然后再等我一起回家。

毛主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得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人民。我用近 30 年的无言奉献向社会证实了自己的价值，社会和人民也给予我许多荣誉。1980 年，被晋升为妇产科主治医师，1988 年被晋升为副主任医师，1993 年被晋升为主任医师。这几年，年年被评为盟医院先进工作者。并当选为东胜市人民代表和盟政协委员，还是全盟唯一的中国性学学会委员和唯一连任两届的内蒙医学会、妇产科学会会员。我的名字被收入《中国高级医师咨询辞典》。

苦与乐，耕耘与收获，交织成我这坎坷的人生。对事业的不

懈追求和对人民的热爱是我的精神支柱。“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虽然岁月催人，我的两鬓渐染白霜。但我相信，只要“有一点精神”，生命之树就常青。

谁说女人只有眼泪

珊 丹 忆述 尹瑞平 靳明群 执笔

1940年4月，我出生在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左后旗的一个贫苦农民(蒙族)家庭。孩童时期，我目睹了旧中国瘟疫、疾病给父老乡亲们带来的痛苦。从那时候起，为劳苦大众解除病痛的念头，就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悄悄萌生。解放后，政府免费送我上了中学，后来又上了内蒙古医学院，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宿愿。

1963年7月大学毕业，我和爱人那顺布和来到了偏僻落后、缺医少药的乌审旗医院。秋天，医院派我到沙尔利格公社朝岱大队下乡。当时，我患有急性胃炎、子宫肌瘤、功能性子宫出血等疾病，身体十分虚弱。平时上班，由于严重贫血、头昏、眼花，两腿就抖得站不稳。虽是这样，我也没有向组织申诉自己的困难，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下乡第一天中午吃饭时，我只要了一两米饭，才吃了两、三口，便难受得放下了碗。这时，公社书记发现了，他让食堂给我做点面条，我执意不肯。又硬是拖着病体，忍着饥饿，和其他同志步行30多公里到达了朝岱大队。

1964年，我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为了工作方便，我让爱人再次把只有二岁和一岁的两个孩子送回老家。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岁的小女儿挥动她那白嫩的小手眼泪汪汪地和我告别时的情景。我万万没想到，这竟是我们母女俩的永别！10个月后，我接到电报，女儿因患结核性脑膜炎医治无效夭折了。噩耗传来，我痛不欲生。在孩子正在需要母爱的时候，我却不能守护在她的身旁，我

绝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在一段时间里，我只要一闭上眼，就看到孩子的音容笑貌，食无甘味，夜不成寐，身体每况愈下。后来，紧张的工作冲淡我对孩子的哀思。

1965年，我在乌审召公社巡回医疗。有一天，一位牧民急匆匆地来到医疗队，说他的爱人病的非常厉害。于是，我立即和他骑上毛驴，赶到50多公里外的患者家，当时我又饿又冻，疲惫不堪。但一见到患者，我就什么都忘了，立即开始诊治。病人全身浮肿，特别是下肢和会阴部肿胀得非常厉害，病情十分严重。当时，我初步确诊为肾性水肿。由于走得较急，没带更多的医疗器械，我就用银针试着在病人的会阴部扎了一针。结果，体内的水肿液像泉水一样喷射出来。即刻，水肿消失了许多，病痛明显减轻。在用药的同时，我又细心观察了3天。返回医疗队后，盟里巡回医疗队的两位大夫听了我的汇报后说：“你对患者的处理是正确的，但是怕病人得尿毒症，要赶快抬回来。”于是，我又骑上毛驴跑到患者家，和她丈夫用担架将其抬到公社。后来，盟巡回医疗队的大夫按照我的处理意见，给病人进行了治疗，患者痊愈了。

1968年，我和爱人都被调到乌审召医院工作。在那里，患者与我结下的深厚情意，至今留下较深印象。

1979年，我调到伊盟医院传染科后，就遇到一位危重病人。好几个科室见状，推手不看。我和本科大夫商量后收下了他。病人无儿无女，唯一的侄子把他送到医院不久便悄悄地溜走了。病人入院后没钱吃饭，就把我的值班饭让给他。由于我从医术和精神上给了他很多帮助，才打消了他两次寻死自杀的悬念。

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既要有一颗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心，还要有一手精湛的医疗技术。在诊断东胜市泥画社白忠和的病情时，大部分医生认为是由脑血栓引起的。经患者到内蒙古有关医院进一步确诊，才证实了我的意见——他患的是脑结核瘤是正确的。白忠和从内蒙回来后，我又给他办起了家庭病房。寒风凛冽，

每天还得跑上一二公里路去给他开药、输液、打针，直到他去逝。

1981年，是我的一个转折点。伊盟卫生局调我到盟卫生学校任教。说心里话，我从事了近20年的医疗临床工作，对医院、病床、患者，有着一一种特殊的感情，当时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后来我想，就算是我马不停蹄地跑，一生中又能为多少患者解除病痛呢？如果我将学到的知识传授给他人，让更多的人把医学知识和技术掌握到手，岂不是比临床工作更有意义吗？于是，我欣然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工作中的困难还是很多的。我在盟卫校用蒙语讲授西医小儿科课程时，没有现成蒙语教材，我就将汉文教材翻译成蒙文，组织教学。前后共翻译出6万多字的西医儿科方面的教材。当时的干劲很足，翻译到深夜一两点钟是常事，有时还要熬到凌晨三四点钟。然而，每当我患的子宫肌瘤发作时，真是疼痛难忍。

自我任教以来，完成授课学时2000多个，培养学生近2000名。我区各盟市以及新疆、青海、甘肃等省区，也都留下了他们“治病救人”的足迹。

1987年12月，我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任伊盟支部宣传委员。1990年8月，我被晋升为高级讲师。1989年6月，我被推选为伊盟政协委员后，围绕伊盟卫校的实际情况，我先后写出了几条提案，都引起了盟委和行署领导的重视。比如：在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伊盟卫校职工宿舍楼已交付使用；教学楼正在施工；学生实习基地的建设也开始筹措。

我爱医学事业，更爱医学教育事业。我现在虽已年过半百，但我愿把全部心血和汗水化作春雨，化作甘霖，去沐浴、去滋润那些为改变我盟卫生面貌的莘莘学子，让他们为伊盟的昌盛，人民的健康献热、发光！

马背放歌铸“铁嗓”

杨玉兰 忆述 王 鑫 执笔

1964年，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年。这年，我被选为自治区乌兰牧骑代表队队员，进京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人民汇报演出。演出结束后，我们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周总理对我说，你会唱很多各种歌曲，唱得又好，不愧为是蒙古民族的铁嗓子。你们来到城市，不要忘记农村牧区，要回到马背上去，多为农牧民服务。多少年来，我牢记总理的教导，不论遇到什么曲折，是总理的教导给予了我无穷的力量，使我一步一步坚定地向前走。

1941年2月，我出生在巴盟大树湾乡一个牧民家里。我的父亲，拉四胡、打扬琴、弹三弦都会；而我的母亲则会唱好多好多的民歌。虽然他们都不是搞文艺的，但他们在我的童年，却给了我艺术的熏陶，加之父母又给了我一副铜铃般的嗓子，使我从小就爱唱歌。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我的父亲从巴盟调到了伊盟杭锦旗吉格朗图乡工作。1950年，我也来到了这里，并就读于杭锦旗巴拉亥乡小学。父亲可能觉得我是一块艺术家的料，也可能是有意培养我，大凡乡里开会或有什么活动，便让我去给叔叔阿姨们唱歌。没想到，我一个小孩子唱出的歌，竟会引来那么多大人的巴掌声。渐渐地，我的歌声随同我的名字传出了乡里，传到了旗里。

1957年夏初，杭锦旗文艺队到巴拉亥乡为当地的农牧民演

出。文艺队张队长把我叫到他面前说：“听说你歌唱得不错，要是唱得好，我们就要你。”当时，我真不知所措，可爸爸妈妈却在一旁鼓励我，其他人也让我唱。唱就唱，我心一横就唱了一首《敖包相会》。唱完后，张队长微笑地说让我再唱一首。于是，我又唱了一首《草原情歌》。真没想到，这两首歌使我在理想的征途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7月份，15岁的我跨进了杭锦旗文艺队的大门。从此，歌声伴我踏上了既平坦又坎坷的道路。

杭锦旗文艺队是1956年才成立的。那时，我向老队员请教，每天五、六点钟就起来吊嗓子，训练歌子的唱法技巧。通过专门训练，我提高的很快，不久就成了队里歌唱演员中的骨干。1958年8月份，我们文艺队应邀前往山西太原市等地进行文艺演出。在太原的舞台上，一曲《桂花开放幸福来》成为我第一个打响的歌曲。一个多月里，我走一路唱一路，受到了众人的欢迎。此时，我要当一名出色的歌手，当一名歌唱家的念头在我脑海里萌生了。于是，我练功的劲头更足了，流得汗水也比以前多了。鄂尔多斯是歌的海洋，舞的故乡，这里不仅有出类拔萃的民间歌手，而且几乎每一个牧民都会唱歌。在农村牧区演出中，我一有机会就向民间歌手们请教。为了掌握更多的民歌，我不断地在“歌海”里挖掘。歌怎样才能唱得有味？小时候只是跟着父母“呀呀”学唱，丝毫不懂歌的内容。在歌海里遨游的时间长了，就品出了歌的“味道”。鄂尔多斯民歌是蒙古族的身影，其中有说不尽的悲欢兴衰。1959年，伊盟举办首届专业文艺团体汇报演出，由于鄂尔多斯民歌哺育了我，在汇演中，我获得了独唱二等奖。为此，1962年举行的全自治区“三独”（独唱、独奏、独舞）汇演中，盟里便让我代表盟队参加。这次汇演，我获得了独唱一等奖。随后在1963年，我被选为全区乌兰牧骑代表队队员，进京演出。这以后，我曾多次进京演出，受到周总理的7次接见，每次总理都给予我极大的鼓励与鞭策。1964年，我被调到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1965年底，在周总理的指示下，我们直属乌兰牧骑组

队赴全国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巡回演出。在演出中，我以别具民族风格和浓郁地方特色的歌曲赢得了各地广大观众的喜爱。每演一场，唱二、三个歌子根本下不来，最起码也得唱八、九个歌子，有时唱到 12 支歌曲。两个多月的巡回演出，虽然吃了不少苦，但却使我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每到一处，我都学习几首当地歌曲，吸收那里演唱艺术的精华和营养。可正当我向演唱艺术的高峰攀登时，“文革”开始了，我一个被党和人民培养起来的歌唱演员，竟在一夜之间被打成“内人党”。1966 年底把我从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揪回了杭锦旗乌兰牧骑进行审查批斗，并剥夺了我参加演出的权力。我苦恼，我想不通。就在这时，我却想起周总理的教导：你们要回到马背上去，多为农牧民服务。是啊，为农牧民服务，为群众服务的权力谁也剥夺不了。于是，我一有机会就会为群众演唱，一些单位请我去为他们指导排练，我也悄悄地去。直到 1969 年 5 月份，我终于被“解放”了，从此我又回到了日思夜寐的舞台上。1973 年 8 月的一天，我们来到哈劳柴登公社演出，演出结束就要启程的时候，突然听说附近有这位全身瘫痪的老额吉孤单单地躺在家里看不上演出。“瘫痪的老额吉”——我马上想到了她，走，给老额吉唱歌去。在一间低矮的土房里，我看到炕上躺着一位双目失明且又瘫痪的老人。面对老额吉，我就象对着自己的母亲一样，唱了一首又一首歌曲。渐渐地，老额吉脸上的肌肉在颤抖，大滴大滴的泪珠从干涸的眼眶里溢了出来。歌声唤醒了老人那颗常年沉睡的、寂寞的心，也使我的心与人民群众的心贴得更近了。像这样的演出，在我的艺术生涯中又何止一次两次呢。杭锦旗的赛乌素公社，处在库布其沙漠的深处，周围是绵绵数百里的沙丘，进出极其困难。在这里，也撒遍了我的汗水，留下了我的脚印。

1974 年，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从杭锦旗乌兰牧骑调到了伊盟歌舞团。在这里，党和人民给了我更加广阔的艺术天地。1978 年，在全区专业文艺团体汇演中，我获得了优秀表演奖。为了使我的演